论国际环境法的十项基本原则

刘大群

现代国际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国际环境法作为一个新的分支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本世纪以来,随着各种经济活动和国际交往增多,人类对环境认识的加深,国际环境立法活动也逐渐增多,从中产生并确立了国际环境法的一些重要法律原则。本文所论述的十项基本原则中,有几项原则尚在形成之中,但这些原则对国际环境法的发展与当前国际环境的保护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一、国家主权原则

国家主权原则是国际环境法中的一项重要原则,几乎所有的国际环境法律文书都涉及到这一原则。

根据国际法,一国有权根据其本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制定符合本国国情的环境政策,并有权按照本国的环境政策治理本国管辖范围内的环境问题。国家主权原则是国际法上早已确立的一项基本原则,在国际环境保护的领域中,这一原则尤为重要。一个国家的环境问题主要是该国主权范围内所管辖的事情,任何外国不能以保护环境为理由干涉该国的内政。一些发达国家往往以保护环境为借口,干涉别国的发展计划和资源的开发,限制别国的经济发展,这显然违反了国家主权原则。

另外,每一国家对本国的自然资源和一切经济活动拥有充分的永久主权。这已为国际社会的实践与国际法律文书所确认。1974年联合国第29届大会通过的《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第2条第1款规定:“每个国家对其全部财富、自然资源和一切经济活动享有充分的永久主权,包括拥有权、使用权和处置权在内,并且自由行使此项主权”^①。1991年6月19日发展中国家环境与发展部长级会议通过的《北京宣言》明确指出:“必须充分承认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利,保护全球环境的措施应该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发展。”

在环境保护的领域中,西方国家对国家主权原则的适用发生了极大的变化。1894年,美国和墨西哥为流经两国的格兰特河的改向问题发生了争议。美国司法部长哈蒙就此案提出了法律备忘录,该备忘录强调每个国家在其本国领土管辖范围内行使其权利不应受到任何限制。因此,美国有权使其境内的河流改向,而对墨西哥造成的损失不负任何责任。这就是所谓的“哈蒙主义”。所谓“哈蒙主义”实际上是对国家主权原则的曲解和滥用。根据国际法,一国在其境内的合法活动,如果损害了别国利益,也应该承担国际责任。但是在当前,西方国际法学界的一些学者却认为国家主权原则在国际环境立法方面已成为过时的产物。他们认为:“在处理跨国范围的问题时,作为目前法律基础的主权概念已构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碍”^②。他们甚至把环境责任、法律制度的进展缓慢归咎于“各国死抱着国家主权概念不放”^③。可见,西方法学家对国家主权原则完全采用了实用主义的态度,这至少是一种不够严肃的表现。

二、使用自己财产不影响别人财产原则

“使用自己财产不影响别人财产”原则是一条古老的法律原则。自从人类社会产生私有财产和私有制以来,这一原则作为调整人类社会财产关系的行为规范就已存在了。几千年来,它作为一条重要的民法原则

与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相辅相成、互为补充。

1934年,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特雷尔冶炼厂仲裁案”中适用了这一原则,从此,这一原则已成了国际环境法上的一条重要原则,逐渐为世界各国所接受。“特雷尔冶炼厂仲裁案”是美国与加拿大两国涉及空气跨界污染的纠纷。该案是美加边界上位于加拿大境内的特雷尔冶炼厂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硫,给美国境内的环境和农牧业造成了明显的损失。仲裁庭作出了如下裁决:“…任何国家无权使用或允许使用其领土,以在他国领土内或对他国领土或其中的财产及国民排放烟雾的方式造成损害…”。该案在国际环境法中已成为最重要的案例^④。1949年,国际法院在处理英国和阿尔巴尼亚之间的“科孚海峡案”中,认为阿尔巴尼亚应对英国军舰在海峡触雷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指出:“每一个国家都有义务不得故意使其领土被用来从事违反别国权利的活动”。^⑤

1972年,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大会通过了《斯德哥尔摩宣言》,其中第21项原则就明确地提出了“依照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各国具有按照其环境政策开发其资源的主权权利,同时亦负有责任,确保在它管辖或控制范围内的活动,不致对其他国家的环境或其本国管辖范围以外地区的环境引起损害”^⑥。1974年12月12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第31条也规定:“所有国家有责任保证,在其管辖和控制范围内的任何活动不对别国环境或本国管辖以外地区的环境造成损害”。^⑦

“使用自己财产不影响别人财产”原则在双边条约中,特别是在邻国之间的环境协定中已占据了重要的地位,逐渐为各国的条约实践所接受。该原则在80年代,在多边国际公约中也得到了采纳,如保护臭氧层的《维也纳公约》和《蒙特利尔议定书》,从而确定了其作为国际环境法的一项重要原则的地位。其中最具有影响的国际公约是1982年通过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该公约第194条第2款规定:“各国应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确保在其管辖或控制下进行活动不致使其他国家及其环境遭受污染的损害,并确保在其管辖或控制范围内的事件或活动所造成的污染不致扩大到其按照本公约行使主权权利的区域之外”^⑧。

“使用自己财产不影响别人财产”原则实际上是对国家主权原则的一种补充。这表明一国在其领土或管辖范围内不能为所欲为,其行为以不影响别国利益为限。这一原则是各国在国际环境事务中应遵守的最起码的行为准则。如果世界各国都能按照这一原则行事,世界的环境状况将会大有改观。

三、公平区分责任原则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当前全球环境恶化主要是由于自产业革命以来的人类活动所造成的。几个世纪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为了追逐高额利润,维护高消费的生活水平,对全球环境造成了巨大的损害。例如,全世界每年约产生10亿吨的危险废弃物,其中有90%产生于发达国家。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统计,发达国家产生的废弃物有20%被输送到了发展中国家。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处理水平和技术能力有限,这些废弃物往往引起严重的环境污染,对人的身体健康造成极大的损害。就破坏臭氧层的氟氯化碳类物质而言,发达国家的生产量与消费量占全世界总量的85%以上,而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根本没有生产能力,即使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具有一定的生产能力,其产量在世界总产量中所占比例甚小。因此,要求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共同承担停止生产与消费氟氯化碳类物质,平均分担所需的额外负担,是极不公平的。现在,国际社会普遍关心气候变化、全球变暖问题。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大气中温室气体的增多,特别是二氧化碳含量的增加。这与人类社会对矿物燃料(如煤、石油等)的生产与消费有关。但是,各国对能源的需求与消耗水平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75%,而消耗的能源只占世界总量的25%,而发达国家的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25%,而消耗的能源却占世界能源总量的75%。就人均消耗水平而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别就更大。以美国为例,根据绿色和平组织的资料统计,美国人均能源的消费量是中国的12倍,是卢旺达的100倍。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如果让美国与卢旺达承担同样的义务和责任,那将是极不合理的。

在治理全球环境的问题上,发达国家应当承担主要责任和义务已为许多国际法律文件所确认。1989年9月7日,第九届不结盟国家政府首脑会议发表的《环境宣言》中“强调发达国家对环境损害应负主要的责任,同时,也应对全球环境保护负主要责任,其中包括向发展中国家提供额外的资源”。1989年11月通过的《关于防止大气污染和气候变化的《诺德韦克宣言》指出:“由于工业化国家促进了温室气体浓度的增加,也由于它们的能力,它们负有特殊的责任”。1990年5月16日通过的《贝尔根部长宣言》表示:“欧洲经济委员会和欧洲共

同体的成员国完全认识到它们对全球环境问题的特殊责任……”。《北京宣言》认为：“保护环境是人类共同利益，发达国家对全球环境的退化负有主要责任”。全球环境状况的恶化是全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因此，保护和改善全球环境则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但就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具体情况而言，对全球环境恶化的责任又是有所区别的，发达国家应责无旁贷地对此负主要责任。

由于发达国家对全球环境状况的恶化负有主要的责任，它们对发展中国家的帮助、对国际环境基金的捐款以及对发展中国家转让对环境无害的技术是它们对国际社会和对保护环境的共同事业应尽的义务，而不能认为是一种援助，更不能把这当作一种恩赐。

四、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一致原则（持续发展原则）

环境保护问题和经济发展是紧密相联、相辅相成的，两者不能有所偏废。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更有效地保护环境；只有保护好环境，才能更好地发展经济。《北京宣言》指出：“环境问题绝不是孤立的，需要把环境保护同经济增长与发展的要求结合起来，在发展的进程中加以解决”。对于“持续发展”问题，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第十五届理事会曾对持续发展的概念发表了声明，该声明认为：“所谓持续发展是指一种发展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人满足自身需要的能力，而且绝不意味侵犯别国主权。理事会认为，持续发展的实现包括国内和国际上的合作。持续发展意味着促进国家和国际的平等，包括根据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发展计划、优先事项和目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持续发展又意味着创造一种支援性的国际经济环境，在良好管理环境方面具有极度重要性。这种环境将导致所有国家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还意味着对有助于生态的恢复和经济增长的自然资源基础的维护、合理使用和发展。持续发展进一步意味着把环境方面的关注与考虑纳入发展计划和政策，而并不构成援助或发展筹资方面的新条件”^⑨。无论何种定义，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其主要目标就是在保护环境的同时努力发展国民经济。

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与发达国家的环境问题具有本质的区别。发达国家的环境问题主要根源于盲目追求高额利润，维持高消费的生活水平。而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主要是由于发展不足而造成的。发展中国家的首要任务是解决人民吃饭、穿衣等基本需要，解决穷困问题。因此，“持续的发展和稳定的经济增长，是改变这种贫困与环境退化恶性循环并加强发展中国家保护环境能力的出路”^⑩。发达国家不应以保护环境为由限制发展中国的经济发展，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提出新的条件。

五、国际合作原则

当前，全球环境恶化是整个国际社会共同关心的问题。因为许多环境问题具有世界的普遍性，已越过了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界线，光靠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努力根本无济于事，必须依靠整个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几乎所有关于保护全球环境的国际法律文件都规定了国际合作原则，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增进相互了解、建立新的合作关系问题。

发展中国家是发达国家的4倍，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2/3。任何保护全球环境的努力，如果没有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参与，都会一事无成。发展中国家是发达国家转嫁环境污染的受害者，也是全球环境状况恶化的最大的受害者。过去，发达国家片面强调发展中国家应共同承担治理环境污染、保护全球环境的义务，而不考虑发展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能力，其结果只能加剧南北矛盾，使国际合作原则成为一纸空文。近年来，在国际环境立法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提出了建立新的合作关系的倡议，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在保护环境方面提供的帮助不应被认为是一种援助，而是一种为国际合作应履行的义务。1990年6月，《蒙特利尔议定书》的缔约国通过了对该议定书的修正案。经修正的议定书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建立保护臭氧层的基金机制。该机制主要由发达国家出资，其受益国是发展中国家，主要用来支付发展中国家为了实现议定书所规定的限控指标而产生的增加费用。该基金的建立是国际社会通过国际合作共同治理环境问题的一个新的里程碑。经修正的议定书还规定了发达国家以公平的和最优惠的条件向发展中国家迅速转让技术。经修正的议定书不但为解决全球共同面临的环境问题找到了出路，也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开展全球合作创造了先例。

1990年11月，第二次世界气候大会通过的《部长宣言》也明确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的

条件。发达国家必须提供“新的、足够的和额外的”财政资源，“以公平和最优惠的条件”，向发展中国家“迅速转让对环境无害的技术”。国际组织应利用一切有效的机制，消除技术转让的现存障碍，保证发展中国家能得到这些技术。同时，应对现在的专利制度进行深入的研究，使之不致成为技术转让的拦路虎。有关环境的考虑不应成为有关援助和贷款的新的条件，也不应该成为制造非正当贸易壁垒的借口。

六、预防原则

预防原则(Precautionary Principle)是国际环境法中的一项重要原则。所谓预防原则系指在重大的环境污染发生以前，采取政治、法律、经济和行政等各种手段，防止此类环境污染的发生，即所谓“防范于未然”。预防原则已成为当前国际环境立法的指导原则和基本思想，例如：保护野生动植物的《濒危公约》，保护臭氧层的《维也纳公约》和《蒙特利尔议定书》都是以该项原则为指导的。《维也纳公约》中的前言“注意到国家一级和国际一级已经采取的保护臭氧层的预防措施”。《蒙特利尔议定书》的缔约国“决心采取公平地控制臭氧层物质全球排放总量的预防措施，以保护臭氧层”。

预防原则主要根基于环境污染后果的严重性与治理环境问题的复杂性。环境污染一旦发生，其后果是相当严重的。如印度博帕尔毒气泄漏事件曾造成3万人死亡，20万人残废的悲剧。因此，对环境问题的治理必须以预防为主。另一方面，如果环境一旦遭受破坏，再要恢复原状则要化费相当大的时间与财力，有时，甚至会对环境造成无法挽救的损失。例如，在保护臭氧层的问题上，即便现在全人类都立即停止生产与使用破坏臭氧层的氟氯化碳类物质，臭氧层也要大约100年的时间才能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因为地球上释放出的这些物质大约需要10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到平流层，而且可以存在大约30年到120年之久。因此，治理环境最好的办法就是采取预防的措施与手段。

由于科学上的局限性，人类对某一个环境问题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难免存在着许多不确定性。如果在科学上对某一个环境问题完全清楚了，再采取措施可能为时已晚了。因此，预防原则不一定要建立在确凿的科学根据的基础上，而应建立在“所能得到的最新的科学认识”的基础上。

预防措施和责任制度中的防范措施(Preventive Measures)是不同的。就时间而言，预防措施通常是在污染事故发生之前所采取的防止该事故发生的措施，而防范措施是指“事件发生后为防止或减轻污染损害由任何人所采取的任何合理措施。”在责任制度中，由于很难界定采取预防措施的开始时间，因此，一般而言，预防措施是得不到补偿的。而防范措施在责任制度中是可以得到补偿的。

七、预先通知原则

预先通知原则是有效地防止和减少越境环境污染的重要手段。预先通知主要产生于两种情况下：一是在可能造成越境环境污染的情况下的预先通知，另一种是已经发生了造成越境环境污染的危险情况下，环境污染的起源国有义务尽快通知可能受到影响的任何其他国家，以便使这些国家能及时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防止或减少对本国的损害。预先通知原则的适用是以一般国际法上的善意和友好睦邻关系为前提的。

1949年4月9日，国际法院对英国与阿尔巴尼亚之间的“科孚海峡案”的判决，对预先通知原则作出了精辟的论述。国际法院认为，在科孚海峡的水雷不可能是在阿尔巴尼亚当局毫无所知的情况下敷设的，为了航行的安全，阿方有义务、也有足够的时间发出阿领水内有水雷的预先通知。但是，“事实上，阿尔巴尼亚当局没有做任何事情来防止灾难的发生。这种严重的行为引起了阿尔巴尼亚的国际责任。”预先通知的责任不是基于某个公约的规定义务，而是基于一般的法律原则，例如对人道的基本考虑。法院据此判定，阿尔巴尼亚政府应对爆炸事件造成的生命与财产损失予以赔偿^①。

如果潜在的受影响国有理由认为另一国管辖或控制下的活动正在对其造成损害或可能造成损害，它可以要求该国提出预先通知。在没有条约义务的情况下，该国是否答复或答复是否满意则由该国自行决定。如果起源国在发出预先通知的一定期限内没有得到潜在受影响国的答复，起源国即可认为其预先通知是令人满意的。在预先通知的内容里，起源国也可以自行决定哪些资料涉及国家安全或工业秘密而不宜提供。

在发生紧急事件的情况下，特别是在事故已经发生的情况下，预先通知原则尤为重要。1985年苏联切尔诺贝克核电站发生事故，核污染的范围不仅仅在苏联境内，还远及一些邻国。苏联政府对这一事故并没有发

出预先通知,引起了其他国家的不满,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重视。1986年9月26日,国际原子能机构通过了《及早通报核事故公约》,其第2条规定:“在发生第1条所规定的一起核事故时,该条所述的缔约国应立即直接或通过国际原子能机构将该事故及其性质、发生时间和在适当情况下确切地点通知第1条所规定的那些实际受影响或可能会受影响的国家及机构。”^⑫

预先通知原则虽然在国家实践中已普遍采用,但是在不存在当事国之间条约义务的情况下,尚没有成为含有真正严格意义的一项法律义务,也就是说,起源国不履行预先通知的义务并不构成受影响国提出法律诉讼的理由。但是,根据当前国际环境法发展的趋势,至少在发生紧急情况下,特别是可能对别国的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的情况下,起源国从人道主义和和睦关系出发也应当向邻国发出预先通知。

八、“污染者赔偿”原则

“污染者赔偿原则”是环境法中一项重要的基本原则并具有悠久的历史。它和民法中的“欠债者还钱”,刑法中的“杀人者偿命”等朴素的法律概念一样,主要追究肇事者的责任。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其《法律》一节中曾全面、系统地提到了“污染者赔偿”原则。他写道:“水可以容易地通过任何药物的使用受到污染,因此需要法律保护如下:任何故意污染者应负责在付出赔款以外,使用任何规定的方法来净化水的源头或容器”。这可能是对“污染者赔偿”原则的最早的论述了。从中也可以看出,对“赔偿”应作广义的解释,它既包括了刑事上的处罚,又包括民事上的出资赔偿,还包括了适用于环境破坏方面的恢复原状的民事责任。

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几乎所有的国家的国内法中都在不同程度上规定了或体现了“污染者赔偿”原则。例如,1989年12月26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第十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41条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危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我国环境法中加收超标排污费的规定也是基于“污染者赔偿”的原则。

在跨国环境污染中也有适用“污染者赔偿”的案例,例如著名的“特雷尔案”。为了防止个别国家在国际实践中采取双重标准的情况发生,各国或各个区域对适用此项原则都规定了一些适用的条件和准则。1974年11月14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理事会曾对适用这一原则通过了《有关越境污染的原则的建议》。该建议主要包括四点内容:1、对引起越境污染者所适用的法律不应比适用于其本国相同污染的规定更为严厉;2、对别国的越境污染不应超过本国可以接受的水平;3、应对所有污染者一视同仁地适用“污染者赔偿”原则;4、被污染者在任何国家应享有相同的待遇。

但在实践中,“污染者赔偿”原则在适用中遇到许多问题。例如对“污染者”的确认问题就是一例。污染者可能是自然人,也可能是法人,在国际环境法的领域中,污染者也可能是国家。在一些国家里,工厂企业均为国家所有,如果这些企业污染了环境,国家是否要为这些企业承担法律责任呢?另外,污染的性质也是不同的,有一些污染是一次性的,在这种情况下比较容易确认污染者。但有一些污染却是积累性的,当确认污染者时,是否要考虑到历史的因素呢?发展中国家煤和石油的产量都不亚于发达国家,难道发展中国家也是造成气候变暖的“污染者”吗?因此,在确认污染者时,必须考虑到历史的因素,考虑到发达国家自工业革命以来的四百多年里已向大气排入了大量的温室气体。可见,在国际环境法的领域中,对“污染者赔偿”原则不能机械地适用。

九、和平解决环境争端原则

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是国际法中的一项重要原则,在国际环境法的领域中也同样适用。传统国际法注重于解决争端的途径与方式,力图使国际争端以和平的方式加以解决。国际环境法则更注重于如何防止并避免环境争端的发生。和平解决环境争端的最好方式就是尽可能地消除发生争端的隐患或在争端初露端倪之际立即采取措施制止事态的发展,并尽快妥善解决。在国际环境法的领域中,对环境争端的处理主要分为两个步骤:一是尽量避免或防止环境争端的发生,二是对避免不了的环境争端应采取以和平的方式加以解决。1991年8月在北京举行的“发展中国家与国际环境法”国际研讨会“对适用于环境保护方面解决争端的若干机制进行了探讨,特别强调了诸如通过交换资料或磋商避免争端的方式”。

要做到避免或防止环境争端的发生,作为最基本的要求,各国应按《斯德哥尔摩宣言》第21项原则所要求

的那样，确保在其管辖范围或控制下的活动不对其他国家或对其管辖范围以外的地区造成环境损害。对可能造成重大越境环境影响的活动，各国应通过本国的努力或通过国际合作，努力防止、减少或控制事态的发展。这就要求各国根据其国内法的规定或环境政策在决定批准或进行一项可能造成重大越境环境污染的活动或项目以前，应作出环境影响评估(EIA)。许多国家的国内法中都有这方面的规定，例如我国环境保护法的第13条。欧洲国家于1991年初通过了《在越境情况下环境影响评估公约》，决心加强事先通报和磋商，避免、防止和减少越境环境污染和越境环境争端。

如果双边磋商和谈判没有取得成果，在双方同意的基础上，双方应本着善意和睦邻友好将他们之间的分歧提交一个不偏不倚的第三方进行调解。这种调解是在实际争端发生之前进行的，与争端发生之后的调解还不一样。第三方进行调解无权作出具有约束性的决定，只能以建议的形式提出解决的方案。

与诉诸司法程序相比，调解有许多长处，它不受时间、地点、场地与既定程序的限制，比较灵活。在调解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并不处在完全的对立状态下，因此比较容易达成谅解与妥协。调解程序还能较好地照顾到双方今后的关系问题，特别是在当事双方共享同一资源的情况下尤其如此。

十、公平合理的赔偿原则

国际环境法中的责任与赔偿问题是国际环境法在发展完善过程中的一个新问题。1972年《斯德哥尔摩宣言》第22项原则要求：“各国应互相合作，进一步发展关于一国管辖或控制范围以内的活动对其管辖范围以外地区所引起的污染及其他环境损害的受害人的责任与赔偿的国际法。”^⑬

战后40多年的国际实践表明，任何国家只要其行为对本国管辖或实际控制范围以外的环境造成了损害都应负有责任并进行赔偿。这是国际环境法领域中的一项新发展，也是对传统国际法观念的一种突破。根据传统国际法，国家责任是国家因违反其所承担的国际法律义务，构成国际不法行为而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而在国际环境法的领域中，责任的成立与否并不是以国家对某种义务的违反为前提的，而是以损害的事实为责任与赔偿的根据，也就是说，国家责任不仅仅局限于国家的不法行为，而且也应包括国家的合法行为所引起的国家责任。例如，一国在其本国境内所从事的活动一般都是符合其本国法律和国际法的，但是如果其活动对其他国家的生命、财产与环境造成了损害，就应承担国际责任。

在进行具体的赔偿时要作到公平合理，至少应考虑到下列因素：首先，应考虑到越境损害的程度，特别是受损害方的实际损失以及越境损害的积累性影响；第二，起源国在事故发生以后，是否已采取了防止损害扩大的防范措施，其费用可以考虑从赔偿金额中扣除；第三，起源国与受损害国从事此项活动中所获得的实际利益；第四，从事此项活动对起源国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即对其国计民生的利益关系；第五，起源国是否对可能发生的越境污染予以足够的重视，是否已采取了任何预防措施；第六，起源国是否有采取预防措施、恢复原状、损害赔偿或进行其他替代活动的经济能力和技术水平；第七，起源国与受损害国是否对此类事故采取了任何强制保险措施。之所以要考虑到上述种种因素是为了公平地解决赔偿问题，在赔偿金额中作出适当的减免，特别是起源国能够证明受损害国长期以来已在免费受益于此项活动时尤其如此。在赔偿问题上要尽可能做到“利益平衡”，既能使受害方得到补偿，又不致于给起源国造成太大的经济损失，使其国计民生得以维持。

注释：

①⑦ 王铁崖、田如萱：《国际法资料选编》第378、849页，法律出版社。

②③ 菲力普·桑兹：《环境、社会与国际法》，《哈佛国际法杂志》1989年春季号，第30期，第393、395页。

④ 联合国《国际裁决报告》第3卷，第1905—1981页。

⑤⑪ 《国际法院报告集》(1947—1984)，第15—18页。

⑥⑬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法指导方针与原则》第1集，第5页。

⑧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94条，纽约，联合国出版物。

⑨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第15届理事会文件。

⑩ 引自发展中国家环境与发展部长级会议《北京宣言》，见1991年6月20日《人民日报》。

⑫ 见《国际法律资料》第25卷，第6期，1986年11月，第1370页。